

随着5部获奖作品名单出炉,备受关注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尘埃落定。军队作品在本届评奖中颗粒无收,这对于曾显得十分强势的军事文学,以及把是否获奖看得很重的人们而言,不免感到颇为失落与遗憾。

其实军队文学作品获奖与否都在情理之中。“茅奖”实行大评委制和实名制,这意味着获奖的偶然性大为降低,任何作品都必须接受更为严格的检验,真正到了拼实力、拼质量、拼影响的时代。无论存在多少争议,茅盾文学奖无疑是国家最高级别、最高水平的文学大奖。每一届评奖本身的意义,就是以评奖的方式盘点4年之中长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遴选最突出、最优秀者授予桂冠。任何一部有勇气、有自信报名参评的作品,相信都是因其具备一定的质量与特色,最终能够在激烈竞争中获奖当然是莫大的荣誉。把盞奖杯倾情庆祝也未尝不可。其实许多由于名额限制未入选的作品,其质量未必就比获奖作品差到哪里去,仔细探究起来仅在伯仲之间而已。而这类作品的存在恰恰更能反映出现阶段中国文学创作的实绩和厚度。

部队此次参评作品,如《拆裂》《流芳记》《回家》《突围》《九号干休所》《全金属青春》等,都是近年部队作家倾尽心血、各具千秋的优秀之作,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和指出每部作品的艺术魅力和独特价值。但从这些作品的总体思想艺术质量来衡量,与此番全国参评的强手如林的阵容相比却并不占优。《拆裂》《流芳记》《全金属青春》等,虽有几分悲壮却也反映了一定的客观实际。

这显然与军队一贯倡导要不断推出精品佳作,为我军争得更大的荣誉是有距离的。因此在评

奖之后应该认真思考,弄清楚军队文学存在的种种隐忧。我想只有正视军队文学创作的现实,消除这些困扰和影响创作的隐忧,才有可能使这一局面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不容否认,军队创作实力呈现出日渐弱化的趋势,使军事文学早已潜伏下令人堪忧的危机。专业创作队伍的老化问题可谓人皆知。本来作为人才蓄水池的专业创作室,新陈代謝几乎处于停顿状态,有的单位十多年未进创作强手的情况并不鲜见。有的本被倚重、寄予厚望的作家心庸意懒,创作力衰减,其情志的低靡比年龄的老化对创作的影响更甚,整个创作队伍已很难再度呈现上世纪80年代那样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情形。一些曾有很大影响力和很强实力的作家移情影视,摇身变为这一走红艺术门类的创作中坚,甚至是其中心炙手可热、响当当的“大腕”,在影视持续走强、效益持续看好的情形下,根本不可能指望其重归文学。

而热爱文学创作的部队年轻作者本已是凤毛麟角,且难以如愿以偿进入专业创作队伍,随着时日的迁延便如流沙般消失于无形。一些被大单位所重视珍惜保留下来,确具很高文学才华,令人可以期待的年轻作家,尚未形成可以喷云吐雾、呼风唤雨的大气候,还需时日强健丰满其体格和羽毛,

还需以众多的力作在文学领域奠定其应有地位。形不成优秀甚至是顶级作家队伍的厚实阵容,拿不出更多一流的文学精品,若欲再度问鼎“茅奖”,显然颇为困难。

如何与全国文学创作水平同步提高,是军事文学面临的更大挑战。这些年我国长篇小说以每年两千余部的速度出版,而且从其发展势头看只会有增无减。这无疑举世罕见的惊人数字。如果说它仅仅意味着数量的剧增那就大错特错了,其质量与水准的提升也是显而易见和毋庸置疑的。无论从题材与内涵,还是风格与手法,都呈现出多样化特征,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进步。

这其中当然有部队作家作出的重要贡献,但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在越来越雄壮的中国作家队伍中,难以看见军队作家更为令人注目的整齐队伍;在文学突进的开拓步伐中,难以听见军队作家更为令人侧耳聆听的响亮声音。军事文学曾为国家文学的主体,不只是以精深的思想内容,也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创造出独领风骚、万众瞩目、堪称时代典范的军事文学佳作。这既成为军队作家可以用作激励自己的荣誉和动力,更成为现实的压力和责任,迫使他们不仅不能在文学的整体创作格局中缺席,而且应有一种义不容辞的担当,具备依然冲锋在前的姿态和能力。

□汪守德

这就使一个问题异常尖锐地摆在了面前,即军队作家是否仍具有创作的高水平,并且以其卓有建树的创作,为中国文学作出独特的贡献,并在读者中赢得广泛的认可度。实际上我们看不出有更多的军队作家可以进入顶级的行列,能够在整个作家群中堪称翘楚;我们不断推出的作品有许多也难称一流,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宽阔河流中,其思想的深度和审美的建构,都难有引领性和标志性的意义和价值。究其原因,许多作家受自身创作才能与灵气的局限,空怀一腔志存高远的雄心,仍拿不出可与强手比肩的作品;创作中对于思想与艺术的自我捆绑,导致创新精神的严重不足,使作品常陷入老套平庸的窠臼;急躁匆忙仍是不少军队作家的致命短处,许多作品总被人看出种种破绽和瑕疵。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军队作家绕不过去的,即读者对军事文学原创力和想象力越来越高的要求,也无情地考验着军队作家。军事题材始终是社会和读者持续关注的领域,军事文学曾经提供和传递的思想与审美,曾给人以很大的满足。但近些年让读者有步入思想艺术新天地之感的作品是少而又少的。军事文学似乎困于一种既有的审美定势,使一些作家推出的新作总令人感到有些裹足不前、新意不足,难以产生更大的冲击力和感召

军旅文学发展的激越呼唤

□王凤英

回望近年军旅文学创作,从军旅题材影视剧收视率攀升得异乎寻常,到不在少数的军旅作家义无反顾投身编剧的热潮,军旅长篇小说创作数量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时期,似乎所谓的“第四次浪潮”真的气象万千地汹涌而至,是不是就应该判断新中国军旅文学史上最为缤纷最为雄浑的时刻已梦想成真?这种惊喜比现实更为耐人寻味。更接近真相的事实是,通过非原创性的类型化写作可以发现产生精品的艰难性,军旅文学在经历过表象的繁华之后,“不是指向天空,而是指向希望”,需要放慢节奏沉湎出慎莫“速朽”的时代不朽佳作。

已然成势的题材“格式”

无疑,军事题材本身的特质和当前社会生活的某种趋向构成了读者对这一类作品的情有独钟,这种文化现象令人想起一种精神的奔走,似乎是人们已经厌倦了冗庸的生存本能的呈示,开始恢复更接近灵魂“回家”的本能指向。这是当下多元社会图景中人们面对工作和生活压力而呈现出的无奈投射,希望能够更新生活状态进而追求归宿感,于迷阵中寻求一种精神突围和对生命活力的自我求证。

然而,长期的和平生活,军人在战场上的固有待期待庸常化的琐细事务兼并,那种过去时代的光辉和英雄主义品格隐匿于现实和理想的挣扎过程之中,甚至被现实中的矛盾击打得无所适从。在《我在天堂等你》《楚河汉界》《音乐会》等军旅历史题材力作之后,作家们图省事也好,避难就易也罢,纷纷投注军旅历史题材。一时间,这样的取巧策略蔚为大观,已然成势地作为一种题材“格式”存在,覆盖了小说、散文,甚至诗歌领域,而军旅长篇小说领域尤为严重。从近年军旅长篇小说来看,军旅现实题材较之军旅历史题材的确冷清清清。虽然《醉太平》《突出重围》等力作迭出,但对近年倾向性的军旅文学的创作内伤而言,治疗效果不断反弹。似乎我们该宽容地忽略重题材本身,而作家驾驭题材的功力才是重中之重。但是,当军旅作家作为个体面对现实委实无能为力时,作品不等于说不去承载。作家有激浊扬清的社会责任,而回避矛盾显然弱化或消解了这一重要职责。

毋庸置疑,军旅作家在处理和平时期军营题材时遭遇掣肘在所难免。那些特殊的政治话语,那些意识现实中的惯性,更有对当下部队生活经验的缺失或不足、对矛盾反映方式的担忧和无力等等,如何反映当下军人的价值观念、战斗精神、职业追求甚至情感表达等,概念化的模式显然急需突破和超越,但如何突破如何超越,军旅作家尚在探索。设若有一个成功或者不见得多么成功的文本先行站起,接踵而至的模仿等所谓的创作方向便会在千头万绪中暂时领先,不可避免的事就这样发生了:类型化的创作题材带来类型化的人物性格及类型化的故事和情节推进方式。这样做的结果是直接导致艺术观的缺席和作家想象力的终结。

而新军事变革时代的军营生活和新技术时代对战术、武器、兵种以及部队官兵知识结构的表现空间,较之以往更需要与时俱进的眼光和笔触。越是矛盾的就越是需要处理的,处理的技巧恰能反映作家的创作功力和艺术审美,而这些动辄大叙事,动辄大视角全方位,动辄高科技建构等,这些题材的堆积如山只有一种解释,以作家个人所谓的优越向市场炫技和臣服,似乎惟其如此,才是卓而不群,才是大手笔。

艺术是给可视世界以最高公正的一种尝试,在事物中以及在现实军营生活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本质的东西。假如军旅作家们能够承认这一点,也就应该承认创作中的精神磨难这一法则,在不断加深的孤独感中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他笔下反映的世界是心灵相印而非自为陌生甚至厌倦的。军旅作家面对多元文化的冲撞和空前复杂的生活不迷失不规避,内心孤独是一种必须的参省。孤独是拥挤的心灵中一方阻隔了浮躁气的天空。数月创作几十万字的作品是难以厚重难以感悟透彻的,纵然上电视借新闻造势,也不可能有生命力。没有生命力是作品的致命伤,它能埋葬蓬勃的创造力,宣布一个军人责任和使命的完结,避免境界、折翼一个作家的想象,使其主动放弃军旅文学创作上的出路。

渐行渐远的人物“个体”

法国有一句格言,“一有个性,事情就糟了”。眼下的类型化创作趋向,之所以纷纷模仿,在于这样作往能从方便的来源获取需要的东西,正如重建都是基于以往的经验定式和审美需要。可以曾相识的阅读体验并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更多的似曾相识只会是一种折磨,如熟悉的故事进入方式、语感,熟悉的平民化英雄形象、熟悉的人物关系和场景等等。

首先是不乏世俗体热的英雄人物,他们两耳之前众多不可企及的英雄榜样居然可以触摸,甚至可以毫无距离地对话。李云龙、石光荣、姜大牙等比较成功的英雄像普通人一样,有爱有恨也敢爱敢恨,他们离开了高大全式的完美和冰冷,读者在个体阅读记忆中惊喜地找到参照的坐标和追求的无局限,亲英雄近英雄以至成为英雄的理想是那样具有前所未有的亲和力。这是一个重建英雄叙事的突破,他们满足了人们对英雄理想、崇高信仰或者粗砺的健全人格的文学崭新想象和英雄精神的期待,在一定时间内形成了广泛、持久、向上的精神力量。



电影《小花》

战争是一种极端特殊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人的生死、爱恨、抉择都会被推向极致。人生命运的长河在战争背景下无可避免地要经历波峰浪谷、暗涌急旋、惊涛拍岸。优秀的军旅题材作品,都会着意凸显在特定时代背景和军旅色彩中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当属于个体的命运和细节或宏大或传奇或繁复或简约的叙事中渐渐浮现出来时,时代的风云、民族的性格才会真正地被携带与描绘出来。

如果梳理中国军旅题材影片,可以发现,抒写人物个体的命运在新时期和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有两个创作的高峰。新时期,受整体社会文化生态的影响,探索人性的深层空间,发现与表达丰富的、多侧面的人生命运的内涵,在军旅题材电影中多有突破和亮点。像《一个和八个》《小花》《高山下的花环》《祁连山的回声》《马蹄声碎》《战争子午线》《晚钟》《远离战争的年代》《归心似箭》等。这些影片突破了“十七年”军旅题材影片人物命运的“单向度”模式,即三种经典模式:革命改变命运、引向光明的模式;经历革命斗争与战火历练,走向成熟的模式;革命或战斗传奇与多重考验后,迎接必然胜利的模式。所谓的“单向度”,即所有的枝蔓、支流都必将不可避免地指向预设的命运结局与终点,而人物的命运更多被置换为成长的仪式、传奇的经历,崭新天地、伟大时代的美好愿景。在这里,“共性”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命运”是“复数”的概念,即不单指某个个体的命运,而往往指向一个阶级、一个集体的前途与命运。因而新时期电影中,当那些充满不确定因素改变命运的动机和拐点,那些来自灵魂深处的对战争的反思,那些因战争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失败与命运的劫数被呈现出来时,属于主人公个体性的命运才获得了丰富多元的显现。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创作方针为军旅题材电影开拓了新的格局。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以来,军旅题材影片出现了两类鲜明的创作趋向。一类是“叙事”的流畅性与吸引大众的娱乐性得到加强,像《黄河绝恋》《冲天飞豹》《冲出亚马逊》《平原枪声》《绝境逢生》等,借鉴了爱情片、动作片、喜剧片的类型特质,将主旋律内涵与形式技巧巧妙地融合起来。而这些影片中人物的命运大多与类型化特质中人物的命运相对应,他们个性突出、形象鲜明,但缺乏艺术的深度感。第二类,是注重影片叙事切入的视角,将宏大历史事件通过个性化的感知与观察描述出来,着意彰显的是人物命运与个体情感的抒写与表达。像《我的长征》《我的左手》《我的母亲叶曼》,从片名就明确了一种个体化、小角度的叙述视角,这类影片还包括《走出硝烟的女神》《英雄无语》《血色山谷》《太行山上》《夜袭》《八月一日》《革命到底》《集结号》等。这类影片叙述视角聚焦到人物的个性与命运上,表现的是普通人平凡而真切的情怀,是历史进程和时代洪流中个体化的独特体验。因此,文本是以人带事,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和生动地凸显在事件之上。即使是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声名显赫的英雄,也不再是远离和高高在上,而是赋予他们他们见情见性的人格“内趋力”,从而带动一切成为了可触摸的和有热度的。特别是像《集结号》这部有标志性的影片,将视觉冲击力和情感感染力恰到好处地融合起来,从谷子地的个人命运折射出战争极致化情境下关于生命、良知、抉择、坚韧、荣誉、信念等丰富的内涵与深沉的思考。可以说,这一类军旅题材影片明确的创作视角、努力挖掘个性化的艺术探索,使“战争影片只有宏大叙事”,“英雄形象永远高大全”的想当然的惯性审美认知可以画上休止符了。

艺术的真诚与感动往往来自于人物命运的交响。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艺术创作中人物命运感的抒写是老生常谈,但真正能做好这方面的“文章”并不容易。军旅背景下人物的命运更饱含沧桑感、历史感,人生道路上的坎坷沉浮、悲欢离合,更多出几分事理难料、生生死死,折射出的是大时代潮流对微小个体

蕴时代气象 唱生命之歌

——对中国军旅题材影片人物命运抒写的探寻与思考

□吕益都

命运的爽快。只有透过人物的命运,才能见出性格的层次感、血肉的现实感,传奇的经历只有融入深刻的命运,才能呈现多层次、深广的审美意蕴,曲折的戏剧性才能铺垫出人性的光辉与醇厚的人生况味。

我们注意到,受整体社会文化语境、受众审美趋向以及电影产业化进程的影响,近些年来深入塑造人物形象,深入人物的心灵世界,以平凡视角合情合理地刻画人物特别是普通人的心理感受,越来越成为军旅题材电影创作的共识。近年来创作的几部军旅题材影片,像《沂蒙六姐妹》《喋血孤城》《歼十出击》《惊沙》《飞天》《岁岁清明》等,在人物命运的刻画上都呈现出鲜明突出的艺术质感和独具匠心的意味。这几部影片选择的题材视角都很新颖,这样就将人物的命运放置在艺术的“陌生化”、环境的非常态化、情境的极端化之中,时势造就英雄、性格决定命运,这也就为物性性格个性与心灵感怀的展现开辟出一方崭新的天地。《喋血孤城》描绘的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将领余程万率领虎贲将士死守常德、血战到底的故事;《惊沙》展现了秦基伟所率的一支西路军与马家军的惨烈交锋,碧血黄沙,寡不敌众,绝地突围,英雄本色;《歼十出击》聚焦现代化新型空军军事人才的使命与责任;《飞天》描写了宇航员鲜为人知的情感世界;《岁岁清明》通过少女的视角,彰显的却是“杭铁头”的男儿气概;《沂蒙六姐妹》通过沂蒙老区平凡女性的牺牲与付出,表达出战争情境下女性特有的坚韧的力量、宽广的心灵和细腻的情感依归。

设置悲剧情境,塑造悲情形象,是许多影片凸显人物命运感的重要艺术表现。某种程度上和一段时期内,中国军旅题材影片更多表达的是胜利,赞颂的是豪情。那种惊天动地鬼神、乐观主义的气概和英勇无畏、重于泰山的牺牲,是被反复渲染的。英雄人物的命运一步步都踩在“必然性”的节点上,属于军旅背景的真切的生命凝视和战场状态下真实存在的命运的偶然与悲凉,往往得不到充分的表达。上述这些影片在叙述上能够正视史实,正视绝境中人物本真的心理,主动选择和表现那些艰难曲折的、隐晦的、苦涩的、失败的内容,并于其中努力探索和发掘现实中的本质矛盾、生命的潜能,展现心路的历程,展开诗意的升华。《喋血孤城》和《惊沙》都表现出了面对史实的勇气,叙述用客观的立场和冷峻的视角观照全局,当无可挽回的形势将凶险的绝境推至主人公面前时,当个人的英勇、智慧成为微小的力量无法挽回时,主人公在一次次命运拐点上的表现,往往充满浓烈的悲情色彩。余程万往往往忍和牺牲,面对军事布局 and 战役的结果,他有不得不面对的苦衷,但他保持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男儿气概;秦基伟则在妹妹将被马家军俘虏的时候,为其不受侮辱,在妹妹大声恳求式的呼唤中,不得不亲手开枪结束她高贵的生命。在复杂的军事斗争环境中,显然,可歌可泣的不仅仅是胜利的冲锋和英勇的牺牲,那些生命的礼赞和人性的深度,那些崇高与悲壮,也可以从暗藏的逼势、执著的性情和情感的极限中,迸发出撼人心魄的力量。影片《岁岁清明》的叙事在不动声色中仿佛徐徐缓缓地展开一段绿茶般含蓄清纯的恋情,主人公尹逸白外表斯文柔弱,但他却以强大的内心迫使自己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以及他人的误解,并最终实施了引诱日本兵上茶园并送他们“上西天”的计划。水至柔至刚,上善若水。这个外柔内刚的人物形象正是“杭铁头”的代言与象征。同样是鲜明的悲情形象,在《飞天》中,优秀航天员张天聪在20年的美好时光中,一次又一次与太空梦失之交臂,只能成为他人的备份。别人劝他“信命”、“认命”,但他却“知命”,当青春流逝,希望越来越渺茫时,张天聪依然选择了执著的坚守。性格决定命运,命运也见证性格。逆境将命运引向坎坷,执著将命运引向抗争。可以说,影片《飞天》的动人之处绝非仅仅是神秘浩瀚的太空特设图景,也不仅仅是揭秘航天员的训练场景,而在于这样一位默默坚守,一次次面对失落、一次次在执著中闪耀璀璨生命之光的英雄形象所展现的鲜明性格与悲情意蕴。军旅背景下的悲情不仅对应于战场上的战士,更对应着广大的后方百姓。对生命守望的对话、与命运对话的感悟,尤其在女性身上获得鲜明体现。《沂蒙六姐妹》中,新媳妇月芬是和大公鸡拜堂成亲的,因为她的丈夫正在孟良崮战役的前线,月芬从未见过丈夫的面,她满怀对未来生活的良好憧憬,但无情的战争打破了美好的想象,丈夫在前线牺牲了,她刚刚新婚就变为新寡,她作为女性的命运被推向了一种残忍的极致。尽管不是直接在战场上面对敌人和牺牲,但月芬以及她的婆婆、她的嫂子等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沂蒙老区支前妇女的象征和代言,她们都付出了女性最可宝贵的亲人和青春。她们性格的坚强、人格的高贵,正是通过那些层层叠叠的命运的苦难中默默忍受、无言奉献所体现的。因此,她们的质朴良知,种种鲜明的性格个性、女性的心理情态、细腻的内活动,由于这种悲情的生命底色而愈加鲜明和突出,而对战争的反思,也从她们的悲情命运中自然而然地传达出来。

(下转第7版)

力。思想的前沿、主题的深化和风格的独创等方面,本应是文学的基本追求,事实上不少作家也在这些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但都不曾有效地使当下的军事文学呈现出整体一新的面貌,使之看起来就像信心十足地走在前行的路上,却迈不出大的步伐。

不过颇为令人欣慰的是,不少有实力、有经验的军队老中青作家依然潜心地坚持文学创作,长篇小说仍然是他们的最爱,而且不断有作品在创作和产生的过程当中,证明着军队作家不可小觑的实力,并且有可能在某个时候给我们以大的惊喜。但对整个军队作家的实力而言,文学创新能力和审美水平的提高,则是必须清醒认识和亟待解决的。

比较有利的方面是,从军事题材这一社会生活的最痛处、最深处,以最匪夷所思的方式,甚至是最奇巧刁钻的角度,表现人类的本质和民族的特性,因而虽有无数佳作光耀于前,但对矢志于军事文学的创作者而言,仍有不可穷尽的思想与创作资源。这是军队作家永远的优势所在。问题在于怎样居于今天思想与文学的制高点,以更加深刻的审视与观照,使军队文学的创作处在领跑的位置,达于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新境界。军队作家文学创造力的薄弱与强劲,技巧的停滞与提升,思想的混沌与锐化,都将影响进展的尺度。拿更为优异的作品再度冲击“茅奖”,并折桂而返,这一天是可以期待的。

其实获奖并不是根本目的,重要的是以军事文学所取得的实际成就,真实、深刻而高水平地反映国家与民族的精神内蕴和审美创造力,获奖仅仅是它的附加值,是一种最形象、最直接的证明。

异质疏松的语言“轨道”

文学的恒常标准只能是文学。文学需要语言这一渠道呈现其特质。这种呈现过程不动声色地附着上了作家个人的创作惯性和风骨底色。从一定意义上说,语言表达方式是一个作家汉语写作才气展现和风格。诸如,同样的题材在不同作家笔下其语言感觉和思考维度的区别一望而知。如周涛的散文在诗人气质的流动下呈现出富有张力的语言厚度和唯美情怀。温亚军以不动声色的文字触摸人性有声有色的体温,具有似波澜不惊实则惊涛骇浪的阅读冲击力,给了作品异常灵动的智性风格。同样,有众多评论表现和文章出场频次的殷实,以诗人异乎寻常的灵敏准确点火并审视军旅文学构架的独特思想骨架。《醉太平》“铁藜瘦”式写作,《楚河汉界》“哲学式”痛苦等等,均以极富韵致的干净准确、精约简约的语言设置悬念、曲折故事情节和思想穿透潜力,彰显军旅作家一贯的文学观念和写作立场。

独属于军旅作品的语言底色不可或缺,语言技巧乃是作为军旅文学作品特有的凭恃。这并不是说语言能够决定一部作品的成败,但它确可以宣告作品的艺术质地和作家思想是否乏力。

残酷的是,一些军旅作家因利益驱动也好商业需要也罢,不可避免地采用类型化写作,造成军旅文学的内质被一些军旅作品暗伤。不少已有成绩的军旅作家们的新作在以上原因的作用下一路滑行且不乏乖张离谱,从而自我重复或者重复他人,使语言缺失了应有的张力和意味。有的作品弃置对人物性格心理描写和事件的技巧叙述,跳过交代和必要的铺垫,被作家推着故事一路奔驰。有的作品则靠离奇夸张的情感纠葛吸引眼球,瞎编乱造游离生活,应该充分细腻的描述支离破碎,人物形象模糊拼凑,人物性格云山雾罩,黯然失色的语言在此种混沌中越发无限暇及其基本的流俗,粗疏、生硬甚至不知所云等莫可名状的文字废墟俯拾皆是,更遑论意义和价值。

对于军旅历史题材作品,语言能够先行一步还原历史感的“味道”,这是不争的事实,它见证一个作家的文化积累和思想深度。但是,新近出版的作品却急煞煞地仅凭作家个人想象讲历史故事,而想象力又极为匮乏,历史的细节诸如时代风俗、生活风俗等混迹于作品中便绰绰可笑起来,历史必然失去本体意义而沦为背景存在,那些当下人的生活情感、价值观念及时尚语言等必然会不合时宜地被充斥进来。这些,只能证明作家根本无法让清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损失水准地匆忙上阵。

不能不承认,优秀军旅作品渐流失于短视的急功近利的类型写作,语言表达遗憾地指向一种似乎“默契”的“通道”:故事离奇得离谱,描写省略得彻底。失去字斟句酌后的耐心表述,离开缺少推动力的故事情节,主动颠覆原有的叙事风格,在统一的“通道”里随意、主观地整合着不具备艺术性的作品,需要提醒的是,路还会走多远?能走多长?当作品从类型化的生产向大批量生产出来,那些极具美感的语言,那些生动、深刻、意味深长的语言界定专用词,是否还依稀可见其值得依赖的真实性?

作品是个人行为创造,而一旦写出后就不仅是作家个人的了,她承载着一种使命意义并打上了想象是否缺乏的标签。想象可以衡量一部作品的艺术高下。

军旅文学的发展潮流应该在剥离类型化的不断追问中来到,呼唤创新呼唤现实性吟唱的中锋正笔激越浩荡,全面提高军旅作家们创造性的呼唤仍在高扬。